

# The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Poli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lt and Road”

Shuying Guo Yuhan G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 Abstract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China has launched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complex language situation on “Belt and Road” will affect the effec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official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privat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anguage policy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 policy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combined with the language status of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considers the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ilk Road, which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land Silk Road, is the intersection of ancient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connecting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he language situation on the Silk Road was complicated, and the great role of reasonable language policy in economic exchange and trad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rulers of all dynasties.

## Keywords

“Belt and Road”; Silk Road;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service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语言政策的演变及启示

郭舒莹 甘雨寒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62

## 摘要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与沿线国家展开区域合作。“一带一路”上复杂的语言情况在官方政策沟通与民间合作交流过程中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论文对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政策进行考察, 从古代丝绸之路上语言政策的特点出发, 结合“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 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语言规划提出思考。丝绸之路, 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 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丝绸之路上语言情况纷繁复杂, 合理的语言政策在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中的巨大作用引起历代统治者的注意。

##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 语言政策; 语言服务

## 1 引言

历史经验表明,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文化的融通, 而语言文化融通需要良好的语言政策支撑。考察古代丝绸之路上语言政策对新时代制定“一带一路”语言政策具有积极意义<sup>[1]</sup>。

**【基金项目】** 陕西师范大学2023年国家安全研究学生专项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语言安全规划与话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2023GAXS06)。

**【作者简介】** 郭舒莹(1999-), 女, 中国山西运城人, 硕士, 从事语言及应用语言学、方言地理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 2 古代丝绸之路语言政策演变

汉王朝时期, 统治者注意到语言不通的实际问题, 因此注重外族语教育。《汉书》中记录了统治阶级派人学习乌孙语的实例。

《汉书·西域传》: “元康二年……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 凡三百余人, 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 置官属侍御百余人, 舍上林中, 学乌孙言。”

培养双语人才的目的在于语言翻译。西汉时期, 西域诸国设置了“译长”一职, 即翻译官, 方便了西汉和诸国的沟通。

而民间的语言交流主要依赖于商人和翻译队伍。据文献记载:

《后汉书·西域传》: “商、胡、贩客, 日款于塞下。”

《史记·大宛列传》“诸使外国, 一辈大者数百, 少

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

在丝绸之路频繁的贸易活动与语言交流中，汉民族文化远播西域，形成了西域对早期中华文化的认同。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注重引进外族文化。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史称“伊存授经”。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载：“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引进外族文化需要语言为依托，佛经翻译成为新的现实需求。汉明帝时期，迦叶摩腾、法兰二人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等。其后，陆续出现佛教译经，这些译经由外国僧人口译，汉人助译。从语言应用角度来看，在佛经翻译活动中，语言发挥了工具性的作用，成为一种承载佛教文化的符号。从语言政策的角度来看，此时语言翻译为佛教传播的附庸，官方政策中并未实行具体的语言政策。

在民间，佛经翻译促使越来越多的外族人学习汉语，促进了汉语传播。这一时期，来自西域和印度的僧人为了传播佛教，开始系统地学习汉语。以佛经翻译为目的的汉语教育说明古代丝绸之路中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不局限于商贸往来，而是包容贯通，语言文化得以融汇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重要的商业语言为九姓胡人所使用的粟特语。北魏政府为接待诸国来宾和使节，设置了四夷馆，并在其中一馆配备了粟特语译员。这方便了丝绸之路上商人使节的语言交流，推动了经济贸易的发展。

唐朝之前，阿拉伯地区就已出现零散的汉语教育。隋唐时期，得益于汉王朝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西域人和印度人纷纷到中原定居，这些移民有接受汉语教育的需求，需要大量的汉语教师。此时既学过外语又学过汉语的双语人才成为西域来华者的汉语教师。唐宋时期，阿拉伯王朝派遣使者来华 70 余次，促使使者来华学习汉语。

宋元时期，官方倡导“汉语为本”，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官方政策影响了当时西域地区汉语言文字的使用。汉语在西域被用于公文，汉语词汇进入西域方言中。元朝时期，官方为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设置了“回回国子学”，即官办波斯语学校。为了方便汉族与蒙古族的交流，元朝政府还在各部门设置译史，要求他们“识蒙古、回回文字，通译语”。据《元史·兵志》记载，元政府每年勘合官马数目时，也须以三种语言记录。

明代，除历代政策外，官方设置了四夷馆。明代的四夷馆与北魏政府的四夷馆有所不同。明代四夷馆包括鞑靼馆、女直馆、回回馆、西番馆、西天馆、百夷馆、高昌馆、缅甸馆等八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传授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

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对于丝绸之路沿线的语言政策不

外乎设置翻译官、培养翻译人才、进行语言教育等。具体的政策因外族语言不同而有所不同<sup>[2]</sup>。

### 3 政策特点

#### 3.1 古代丝绸之路语言政策特点

纵观中国历代对丝绸之路的语言政策，可以发现我国历代的语言政策基本一脉相承，历朝历代又根据实际语言需求进行调整。官方政策上，通过汉语教育、培养翻译人才、设立相应语言机构等政策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沟通贸易往来。在民间交流活动中，双语人才在翻译活动和语言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官方语言政策体现出语言与政治有很强的关联性。历朝历代的外族语教育政策为丝绸之路上语言的沟通往来培养了大量的外语人才，为商业贸易往来提供语言服务，大大推动了丝绸之路商贸繁荣发展。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的传播需要语言作为桥梁。可以说，历朝历代的语言政策是以文化为依托的。语言文化机构的设置不仅方便了当时的语言交流，而且为历代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还为后来学者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语言状况提供了历史资料<sup>[3]</sup>。

#### 3.2 “一带一路”语言政策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各参与国推动形成“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局面，致力于将“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推动“五通”、建设“五路”，都需要以语言互通为前提和保障。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官方语言、民族语言众多；中国语言人才培养和储备不足，语言服务能力欠缺。纷繁复杂的语言情况与语言服务问题会给“五通”建设带来潜在难题。

就“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参与国语言情况复杂、中国相关语言服务能力欠缺两个难题，中国在上层建筑层面上积极进行语言规划，提出要加快构建相关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应急体系。

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众多，各个国家语言情况复杂的问题，中国提出建立语言资源库的目标。在语言资源库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将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沿革、民族构成等信息汇总成语言国情动态数据库，为中国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等宏观研究提供支撑；另一方面，收集不同语言的文本和语音数据，构建多语种平行语料库，为语言学研究、语音技术开发提供数据。

针对语言服务能力问题，中国正积极进行语言教育，通过高校体系及各种应急体系培养具有“多语”能力的语言人才。只有语言人才储备库中的语言能力满足“一带一路”的需求，才能基本完成国家语言人才库和语言服务团建设，基本满足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处理海内外事务的语言需求<sup>[4]</sup>。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语言在世界舞台上也应当发挥出重要作用。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甚至汉语方言的人数越来越多;各媒体平台上,用汉语或汉语方言记录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魅力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汉语热”的现象恰恰说明,汉语作为中国的民族共同语在世界语言中备受瞩目。这反映出我国的语言规划不能仅局限于国内,还应站在世界语言视角下进行语言规划<sup>[5]</sup>。

## 4 对现在语言规划的启示与建议

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政策,可以为中国现今面向“一带一路”进行语言规划、制定语言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 4.1 官方政策与民间活动并行

语言资源、语言使用与文化交流、社会安全联系密切,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向影响国家安全。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展开区域合作,逐渐形成了“五通”新格局。语言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在互联互通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然而,“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具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复杂的语言情况在官方政策沟通与民间合作交流过程中会成为政策实施的潜在阻碍。

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情况同样纷繁复杂。中国历朝都重视双语人才的培养。双语人才同时适应了官方和民间两方面与外族沟通往来的需要,体现了官方政策与民间活动的融合。唐朝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域设郡,政府官员、民间商贾、传经僧人沿丝绸之路西进,大大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地区的联系,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可见,官方政策不仅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还为民间交流往来指明了方向;而民间活动中的语言问题影响着官方政策的侧重点。民间活动与官方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文化交流。

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中,官方政策不仅要关注到复杂的语言情况,还要在互相交流中抽丝剥茧,注重发现实际沟通交流中的问题,将复杂的语言情况简单化,在商贸、法律、宗教文化、基础建设等各个方面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语言政策。而企业、个人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语言问题需要官方政策指明侧重点和方向<sup>[6]</sup>。

### 4.2 设立语言文化相关机构

历代统治者设置了不同的官职和机构解决语言问题。“译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丝绸之路上的语言冲突,对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丝绸之路上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波斯文化的沟通往来促使统治者设置四夷馆等专门研究语言文化的机构,这些机构既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语言文化交流,又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的语言和历史文化变革留下了

宝贵资料。

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宗教文化也较为发达。中国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贯尊重不同的宗教文化。在民间沟通交流中,尊重不同宗教的文化首先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沿线各国不同的宗教文化是十分必要的。设立针对“一带一路”背景的语言文化研究机构,可以帮助解决语言文化交流中的问题,满足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长足发展<sup>[7]</sup>。

### 4.3 重视语言互译与语言服务

语言服务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政府、社会及家庭、个人的需求。语言服务具有服务性、规约性和主导性。语言服务的主体是政府,语言服务的客体是政府与语言消费者(李宇明,2014;2016)。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中方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与当地劳工有效交流沟通有利于生产合作,沟通不畅可能会引发合作困难和安全事故,不但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还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引发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政府有关部门成立语言服务团队、建设语言服务平台,提供语言服务<sup>[8]</sup>。

此外,从国家经济安全视角设计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发展战略,可以助推参与国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因此构建语言资源平台与互通网络不仅能够为中资企业在当地更好的发展提供语言支持,还能够维护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下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文化安全。

## 参考文献

- [1] 赫琳,谭昭.古代丝绸之路语言服务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J].文化软实力研究,2017,2(1):41-50.
- [2] 张治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16(4):2-9.
- [3] 李宇明.语言服务与语言产业[J].东方翻译,2016(4):4-8.
- [4] 沈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战略[J].语言战略研究,2016,1(2):20-25.
- [5]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J].中国科技术语,2015,17(6):62.
- [6] 赵世举.“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4):36-42.
- [7] 李宇明.语言服务与语言消费[J].教育导刊,2014(7):93-94.
- [8] 赵世举.从服务内容看语言服务的界定和类型[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3):4-6.